

運動新聞的國族化： 以北平《世界日報》的運動新聞為例， 1933～1935

黃順星^{*}

摘要

民國時期的報業在南北統一後、中日戰爭爆發前，曾出現短暫卻蓬勃的發展榮景，這反映在新聞出版品數量的增加，以及逐漸出現各種專門新聞與新聞專業組織。本研究以 1933～1935 年間北平《世界日報》的〈體育界〉為個案，說明原先在英美報業發展歷史中，代表專業化與通俗化意義的運動新聞，由於此時中國處於內外交迫的危難情勢，運動新聞因而呈現與英美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透過運動新聞的報導，運動被賦予代表國家榮辱、民族興衰的國族象徵。

關鍵詞：運動新聞、通俗報紙、《世界日報》、成舍我

^{*} 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副研究員，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10/8；通過日期：2014/6/22

壹、引言

近來已有不少學者主張，民國時期的中國報業，無疑是近代中國報業發展過程中的黃金年代（de Burgh, 2003；MacKinnon, 1997）。這一方面反映在新聞出版品數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中國新聞事業開啟專業化的步伐，如：大學體制接受新聞專業教育、新聞專業團體湧現，以及逐漸分化而成的專門新聞（specific news）（Xu, 2001: 179）。在黃天鵬（1952）撰寫的〈中國新聞事業大事記〉中，對上海《時報》記載幾個類似又引人注目的發展：

1920年6月9日，創〈圖畫週刊〉，以照相銅板印於道林紙，是中國現代畫報之始。1924年狄葆賢將《時報》轉售與黃伯惠。黃伯惠曾留學美國，仿效 Hearst 風格，注重體育與社會新聞。1927年6月1日，《時報》以套色印行，為中國報紙套色印行之始。

畫報、體育新聞、社會新聞、Hearst 這幾個關鍵字，對熟悉英美報業發展的研究者而言，意味著面向市場，訴諸大眾的通俗報紙（popular press）的興起。以英國報業為例，自從 1855 年廢除知識稅後，源自週日報的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及娛樂性（entertainment）的新聞內容與報導方式，逐漸成為英國日報的主流。而當 1866 年大西洋電纜完成，快速的新聞報導成為可能後，也開啟新聞專業化的發展步伐。1880 年代 T. H. Stead 擔任 *Paul Hall Gazette* 主編後，即對該報的寫作與編輯做極大的變革，繼而引發後續同業在採訪與內容上的仿效。最顯著的就是報導更多的運動、犯罪及娛樂新聞，並且以更活潑生動的版面編輯吸引讀者（Conboy, 2011: 16）。這些無關政治事務的軟新聞，不但增加報紙的收益，也讓這類過去不受重視的軟新聞，爭取到固定的版面，融合軟硬新聞的內容編輯模式，遂成為現代專業新聞的典範（Høyer & Pöttker, 2005）。

類似的發展過程，也顯現於 1930 年代的民國報業。1928 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儘管仍舊存在新聞審查，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替新聞報業的發展扎下根基。在此之前的中國報紙，「關注報紙的啟蒙功能，注重政治新聞和社會評論，輕視娛樂和廣告。20 世紀前 20 年，

中國出版了一些西方新聞實務技巧的教科書譯本。」加上早先時候出國留學人才紛紛返國投入新聞事業與教育，並且引進美式報紙的編輯概念後，即便是外籍駐華記者也認為「中國報界已經採納美式新聞的作法」。具體的事例是日後主掌國民政府對外宣傳事務的董顯光，將美式倒金字塔的新聞寫作模式帶入其所創辦的天津《庸報》，更將傳統的中文直排版面改為橫排，中國報界迅即模仿董顯光的作法（張詠、李金銓，2008）。

但在新聞專業化的分析外，這波媒介史與新聞史研究的復甦中，研究者也都注意到《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Habermas, 1989）與《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983）兩本著作對重新詮釋新聞史或媒介史的重要性。前者著重 17、18 世紀時，逐漸出現一種人民對政治事務之理性意見的傳播與交換活動，特別是展現於報刊上的對話與論辯，既成為實踐公共生活的重要管道，也成為對抗獨裁者壓制公共生活的防禦工具。後者則視報刊為創造共同體連結的有利手段，報刊不只作為公共論述的原始素材而發揮影響力，報刊更對自身、共同體乃至國家認同的建構，產生特殊作用而享有獨特地位的文化素材（Schudson, 2002: 484）。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啟發，產生許多探究報刊、媒體與民主革命、公共性的研究。但以報刊內容為文化素材，分析新聞如何串連共同體想像、形塑個人與集體認同的研究仍不多見。

以中文學界為例，近期由李金銓（2009，2013）所編著的兩本論文集，書名主題分別為「文人論政」、「書生報國」；吳廷俊、於淵淵（2012）的論文亦以類似的「書生辦報」為問題意識，關注焦點在知識份子如何透過報刊實踐政治理念、影響國政。這些近期的研究，固然超越傳統政治意識型態的桎梏，但仍不脫輝格史觀（Whig interpretation）的窠臼。也由於僅關切報刊與政治發展的關聯，對此時出現大量非政治的專門新聞與軟性新聞如何影響或反映民國時期的報業發展；南北統一後報紙如何強化、形塑國族意識以從事國家建設；或統治者如何利用報刊輿論動員群眾，以因應即將爆發的中日戰爭等現象，鮮少投之以目光分析。

因此，本文藉由 Carey 所提「傳播的儀式觀」與新聞史的文化轉向為出發，說明在 20 世紀前後西方報紙在通俗化的發展後，衍生出婦女、兒童、勞工的專屬版面與刊物。這些新聞版面與刊物，所對應

的是西方社會逐漸朝向多元群體與文化的發展。西方通俗報業的大眾化、普及化，乃是相對多元的發展路徑。但類似的過程在民國報業的發展中，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仿效西方現代新聞典範而引入中國的運動新聞，一方面受到西方現代報紙通俗化、商業化的成功發展經驗所啟發，獲得該時期報人的重視，希望以運動新聞此一專門新聞，吸引更多的讀者閱讀購買而增加獲利；但另一方面，當運動新聞引進中國後，卻又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無法產生同時期西方報紙朝向專業化與分疏化的發展，反而成為形塑集體意識與認同的重要利器。

當 1928 年 12 月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後，於 1930 年 4 月 1 ~ 11 日在杭州舉辦「第一屆全國運動會」，當時《世界日報》對該項活動僅有零星報導。但 1933 年於南京舉辦「第二屆全國運動會」時，《世界日報》連續 11 天出版特刊，《世界日報》更於同年底，自行舉辦「世界日報杯」足球賽（世界日報，1933.11.26）。1934 年的「華北運動會」、1935 年 5 月「北平市春季運動觀摩會」，《世界日報》皆仿照前例於賽會期間出版特刊。及至 1935 年「第三屆全國運動會」時，不但依例出版特刊，篇幅更擴增為兩個版面。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北平《世界日報》的運動新聞為個案，分析登載於該報上的新聞、評論與投書，是如何建立起讀者對西方現代運動的認識，說明運動新聞之於當時報紙與社會的意義，以及與英美報業通俗化歷程的異同。

以下先整理運動社會學對運動與現代社會與文化的相關討論，再藉由 Carey 主張新聞作為文化實體的啟發，說明新聞對形構集體認同與共同體想像的重要機制。其次，從西方與民國時期報紙大眾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說明運動新聞在通俗報紙中所占據的地位。最後再以《世界日報》於 1933 至 1935 年兩屆全國運動會（後文簡稱全運會）間的運動新聞及評論為對象，分析說明這些報導與評論的特徵、報刊的文章如何建構起集體的身分認同。

貳、運動、新聞與共同體

運動史家 Guttman（1978）認為運動作為一種被認可的社會文化建置並非普遍存在的，而是誕生於特地地點：英國；與特定時間：工業化早期。儘管中外傳統社會都有不同形式的類運動（sportlike）

(湯志傑, 2009), 而且這些類運動與常民生活的儀式活動息息相關 (Caillois, 1959; Huizinga, 1955), 但從 18 世紀逐漸演變而成的現代運動, 卻徹底與此決裂。對此, Elias (1986b) 以文明化的角度詮釋, 認為文明化的結果是身體直接暴力的逐漸減緩, 殘忍血腥的暴力被虛擬的競賽對抗替代。直接的情緒性需求以間接的方式得到宣洩, 在能夠控制的範圍內製造緊張衝突並在規範中完成:

遊戲競爭以運動的形式, 以包含肌肉控制的方式, 達到前所未見的秩序井然與自我規訓的程度。同樣地, 遊戲競爭得以規則的形式而具體化, 藉此在高張度的肢體競爭與可能的肢體傷害間取得平衡。(Elias, 1986a: 151)

這在運動上就反映為由肢體衝突、直接捕殺, 轉變為間接接觸, 再到具有明文規範與罰則的現代運動競技。例如在中世紀的西歐社會裡, 獵殺動物乃是愉悅快感的來源, 但在文明化過程開展後, 這種粗暴殘忍的愉悅形式發生轉變。最明顯的是傳統由獵人親自動手宰殺的獵狐活動, 在文明化後則由獵犬代替, 獵殺的愉悅轉變為視覺快感的滿足 (Elias, 1986a)。

但在文明化的解釋之外, 現代運動的興起與資本主義成為主要的社會整合機制、帝國主義的擴張、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人口集中化的影響、逐漸壯大的布爾喬亞階級、交通與傳播技術的革新促使通俗報紙興起等等因素, 都在不同程度上促成現代運動的形成 (Schirato, 2007: 42)。尤其是資本主義興起後, 不只勞動生產與資本積累發生理性化的轉變, 生產之外的休閒時間與活動也走上理性化與標準化的過程。加上人口集中於都市, 以及勞動者與中產階級在工資與休閒時間的增加, 都導致社會對大眾文化的商品與服務需求的增加。這一系列的社會鉅變, 讓統治者對大眾娛樂的監控日益困難。這些毫無章法、血腥暴力的大眾娛樂創造出道德恐慌的氛圍, 因而如何掌控管理工人階級在生產之外的休閒活動成為必要的課題 (Rowe, 1999: 19)。

Foucault (1980) 明確指出, 如果不把人的身體有效地投入生產過程中, 不對人口進行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調整, 資本主義的發展乃是不可能的。19 世紀以來人口被視為一種國家資源, 國家的角色是對

人口的管理：管制、規範並確保身體具有妥適行為，成為能夠有效利用的勞動力來源。國家不只應負責國民成員的健康與完善的教導，更應促成國民具備妥善的行為模式與生產力，在諸如此類的身體規訓上，現代運動的論述與實踐發揮著異常顯著的權力效果。因為現代運動中強調的團隊精神、自我克制與規訓、公平競爭等價值，是社會再生產與控制的關鍵。因此，現代運動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建置，最關鍵發展就在於透過教育體系產生的相關論述與實踐，將運動與現代教育予以整合。

現代運動的主要源頭出現在特地為培育布爾喬亞菁英的教育機構中（Bourdieu, 1993: 119）。Bourdieu 同意 Elias 對運動化的分析，贊成轉變的重點是把原先與日常生活關連在一起的民間遊戲，抽離其社會文化脈絡，自成一格地形成有其專屬邏輯的現代運動場域。但 Bourdieu 更強調納入學校教育的運動教學，成為一種本身就是目的的社會活動：

業餘主義（theory of amateurism）實際上是貴族運動哲學特定面向的反映，也就是將運動視為一種無涉利益的實作，運動本身就具有無需其它目標的終極性。運動被構思為可以鍛鍊勇氣、男子氣概、養成品格、培養在規則中求勝的意志，這些都是領導者的人格特徵。（Bourdieu, 1993: 120）

上述運動所帶來的益處，不但是統治教化的核心，同時也是再生產社會關係的關鍵。另外，運動也促成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行為的支配方式，同時又作為身分地位的表徵，而區分出不同的階級身分。如此一來，運動不但發揮圓形監獄自我監視的規訓效果，也同時產生階級區隔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教育機構而蔓延的現代運動，使人能夠安全地感受到激動的情緒，也就是在受控制的範圍內創造集體亢奮（Laker, 2002: 13）。基於這樣的統治需求，現代運動伴隨著大英帝國在 19 世紀的浩大聲勢，在英國境內從貴族階級擴散至下層階級，並因海外殖民而擴散至全球。

這場源起於英國的現代運動革命，在 Hobsbawn（1983 / 陳思仁、潘宗億、洪靜宜、蕭道中、徐文路譯，2002）看來是現代民族主義的重大成果，透過諸如運動這種被發明的傳統，供給想像共同體作為整

合族群與階級差異的黏合劑。因為一方面要求所有參與及觀賞者，不分地域、宗教，團結在民族國家之下，另一方面經由逐漸成形的國際競賽，激化民族國家的認同，當中最顯著的莫非 1896 年重新舉辦的現代奧運。儘管現代奧運強調和平競賽的運動家精神以及國際主義，但不可否認地透過奧運這類國際賽事，不但得以強化國族認同，甚至成為測試一國國力的判準（McIntire, 2009）。

Hobsbawn 提醒這場發生於 19 世紀中後期各種新、舊運動的推廣，無論是一國之內或國際之間，正處於決定性的轉變時期；其次，體育活動的推廣，不但提供這些運動公開表演的空間，同時也是階級同化的機制。最後，體育活動的大眾化使得所有人連結在一起，否則這些人根本缺乏有機連結：

足球不像其他運動那樣，只有原始性和地方性的無產階級球迷基礎，它同時在全國各地蔓延，以至於每天球賽的新聞標題，成為英格蘭和蘇格蘭地區男性工人間茶餘飯後的話題。
（Hobsbawn, 1983 / 陳思仁等譯，2002：354）

換言之，正是藉由 18 世紀中後期大眾化的通俗報業的推波助瀾，現代運動才得以在學校之外於社會中傳遞，而無論是現代國家的治理、國民性格的文明化歷程、階級區異，乃至將特定運動創造為固有之民族傳統，都需透過報刊傳佈擴散而後得以確立。Carey（1997）指出，傳統新聞史研究忽略新聞作為大眾文本所獨具的象徵與儀式意義，因而主張新聞就是文化行動，更是一種歷史實體，是由特定階級在特定時刻中所發明的，而且新聞不只是資訊而是戲劇，更要求讀者的投入及參與。這種相異於傳遞觀的儀式觀，強調分析者面對的問題不是訊息的傳播效果，而是傳播活動如何建構起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的身分認同與集體意識：

傳播是共同信仰的創造、表徵與慶典，即使有的信仰是虛幻的。傳播儀式觀的核心是將人們以團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聖典禮。（Carey, 1992: 43）

Carey 以 Durkheim (1965) 對儀式的分析為例，說明傳播活動除物體與訊息在時空上的位移外，更具備凝聚集體意識的意義，進而延伸至日常生活而維繫共同體的存續。就人類學對儀式的分析而言，參與儀式的意義在於對既定世界觀的強化與集體意識的肯定，社會連結與文化共識在集體儀式中不斷被確認與延續。但存在的問題是，研究者如何從個別讀者的閱讀經驗推論讀者的身分認同與報刊文獻的因果關係？歷史材料的限制以及時間回溯的不可能，的確無法探究個別讀者的經驗，而且對報刊作品的分析，在方法論上都只是對作者意識的分析。但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先經過訴求讀者再返回自身而書寫，因此作品本身必定填充了讀者在內……」。而以報刊為代表的印刷資本主義，重點在於造成一種使人想像神聖的特殊文化。」（蘇碩斌，2011：14-15）。

Carey 主張新聞史的文化轉向，所秉持的也是相同的立場，強調「新聞」是人類想像的特殊形式，營造出看待事物的特定方式，提供行動與感受的形式。新聞反映特定的時代氛圍、情緒或想像，報紙則具體地呈現過往時代的感覺結構，因此報紙必須被看做是人類意識的具體形式，新聞史研究的任務也就在探索這種意識是如何透過採訪與報導的過程而制度化（Carey, 1997: 93）。類似地，當 Anderson（1983 / 吳叡人譯，1999：28）論述想像共同體時，提出共時性的時間觀是創造異質人群得以想像彼此為同胞的重要概念，而共時性時間觀則依賴於小說與報紙，因為「這兩種形式為『重現』民族這種想像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相對於小說，有限期限僅有一天的報紙，更加凸顯此時此刻正有其他操持相同語言的人群，與自己進行同樣的活動。

現代人透過宛若晨禱般的閱報行為，獲得的不僅是某地傳聞或某人軼事，閱報行為本身就是一場公共儀式，讀者知道自己正與素昧相識的陌生人閱讀相同的報導，如此一來：

更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植根於日常生活當中，清晰可見
……。創造出人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
（Anderson, 1983 / 吳叡人譯，1999：36）

從 Carey 或 Anderson 的角度而言，分析重點是閱報行為對讀者產生的影響，尤其是透過報紙對運動新聞的報導，對讀者認同所達成的建構效力：資產或無產階級、國民或臣民、菁英或大眾等不同社會身分的確認，同時也形構成共同體的集體想像。近代中國運動新聞的興起，與 1915 年遠東運動會的挫敗有關，該屆中國代表團成績輸給日本，為體育界視為奇恥大辱。於是新聞界開始重視運動新聞，上海《時事新報》，天津《大公報》紛紛開設運動專欄（楊才林，2011：287）。與同時期英美報業因著眼於運動新聞的可預期性，以及此類新聞相對的安全（無涉社會權力、階級衝突），而成為通俗報業的主要內容相比，中國報界重視運動新聞在足以表達中日兩國國力之消長，特別是後文分析的時段夾處於九一八及七七事變之間，中日兩國的緊張關係更不言而喻。運動，這種在通俗報業被視為休閒娛樂的軟性新聞，在民國報業的發展脈絡中呈現不同於西方的特徵與意義。

參、運動與民國報業

對現代運動來說，驅使現代運動成形的動力來自於文明化歷程的發展，文明化歷程反映現代國家對人口治理的需求，於是經過教育體系此類全控機構的灌輸教化，一來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所需的柔順身體；二來也再生產既定的階級區隔。同樣也是現代性產物的國族主義，更運用原生自民間節慶的現代運動重新創造傳統，成為整合一國之內不同階級、族群、性別的集體表徵，以此凝聚為想像的共同體。而新聞媒體在現代運動擴散的過程中，扮演的不僅止宣傳賽事訊息，新聞媒體更成為文化空間，使行動者與運動賽事成為類型化的符碼與故事形式，而與社會文化產生共鳴（Alexander & Jacobs, 1998: 29）。

回顧運動新聞在英美報業的發展，不難發現一直到 19 世紀中期，運動新聞仍是相對邊緣的新聞類型。運動新聞的擴張必須與印刷技術的變革相關，特別是 19 世紀中採用輪轉印刷機後，報紙得以運用低廉且大量的方式生產後，創造出前所未有、數量龐大的讀者群，構成潛在的大眾消費市場。一方面，大量生產且以廣告為主要收入的大眾報紙開始降低售價；另一方面，針對這群教育水平不高的群眾，報紙以簡單易懂的文字寫作，並選擇以犯罪、運動等聳人聽聞的新聞為報導重心。以運動新聞為例，J. Pulitzer 的《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 在 1883 年首先成立專職的運動新聞組，J. Pulitzer 的競爭對手 W. Hearst，於 1895 年的《紐約日報》(New York Journal) 首先推出運動新聞專版。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在 19 世紀結束前，《每日郵報》(Daily Mail)、《每日鏡報》(Daily Mirror) 和《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都已有固定的足球結果預測專欄(陳子軒，2010.05.29)。自此，運動新聞成為英美通俗報紙的固定版面，奠定運動新聞成為報紙固定文類的里程碑(McChesney, 1989)。

1933 年由英國《新紀事報》(New Chronicle) 進行的市場調查顯示，在大眾、通俗報紙中讀者最常閱讀的新聞是：意外、犯罪、離婚與人情趣味新聞。相較於與公共事務有關的新聞，閱讀比率只在平均值左右，甚至更低。與公共事務相關的新聞，不像運動新聞會獲得特定運動迷狂熱的支持，也無法因為擁有特定的讀者群吸引廣告商的支持。1927 ~ 1937 年間，《每日郵報》的運動新聞占總新聞的比例從 27% 增加到 36%，國內政治、社會與經濟新聞則從 10% 掉到 6% (Curran & Seaton, 1997 / 魏环、劉昌德譯，2001：86-87)。從這些歷史證據可以發現，運動新聞是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才逐漸成為報紙新聞的固定來源，並且日益成為通俗報紙的主流，這與前述 Elias、Hobsbawn 等人論述現代運動的興起與擴散的時間相符。

但對近代中國而言，運動起初並非作為休閒娛樂活動引入，而是基於救亡圖存的急迫性而被重視。黃金麟(2001：41)認為在 19 世紀國族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涉及的是 Foucault 所言的治理性問題。就近代中國而言，從清末開始對現代國民的身體觀歷經「軍國民」、「新民」與「公民」的不同論述，反映的正是在不同時期對身體與國族命運的不同思考與解決之道。特別是在近代中國的論述中，始終充滿著亟欲擺脫「東亞病夫」的焦灼。楊瑞松(2010：35-36)指出，「東亞病夫」一詞進入中國原非專指中國或貶抑中國人民之用語，更多時候這詞語出現的脈絡是 1894 年甲午戰敗後，中國知識分子強烈反省的自我批判之語，更沒有要以體育競技表現來洗刷「東亞病夫」的民族恥辱的論述。必須等到嚴復引介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入中國，「鼓民力、開民德、興民智」成為晚清改革的主旋律後，才逐漸形成國家富強繫於一國人民之體質素養，強國則必先強種的論調。

從清末的洋務運動開始，清廷武備學堂對學生體能的訓練便不遺餘力，並引進西方運動技能課程。民國建立後，1912 年的「壬子學制」

延續前清，將兵式體操為必授科目。1915 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提出《軍國民教育實施方案》，明定各級學校增授中國舊有武技。1928 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重新揭櫫運動與軍事教育政策，並於 1929 年公佈《國民體育法》。1931 年，九一八滿州事變發生，強國保種的焦慮再次成為國民共同關注的焦點，社會出現創造適合中國國情的體育呼聲，並有認為西方運動只是娛樂，必須普及體育而反對錦標主義的浪潮。於是在 1932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全國體育會議」，通過「國民體育實施方案」，逐步建立起體育行政組織^[1]。對上世紀初的中國而言，運動不只是娛樂更是挽救國難的方式。

從教育政策的轉變、運動政策負責人的發言，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末民初，時人將運動與國力畫上等號的集體意識。那麼當時主要的大眾傳媒：報紙，又如何看待這項自西方引進的社會活動？首先可從當時新聞教科書中，作者賦予運動新聞何種意義著手。在徐寶璜（1919 / 2008：65）的《新聞學》中，在「意內」新聞中，徐寶璜提到選舉會、運動會、演說會、紀念會等，此外並無著墨。而在邵飄萍（1923：76）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中，則將新聞分為政治與社會新聞兩類，其中在「專門性質之社會部外交記者」一項提到，相撲、運動乃「屬於專門興致且成特殊地位之外交人才焉。」將運動新聞歸屬於社會新聞，也同樣出現在戈公振（1964：273-276）的《中國報學史》中。

在這些開拓性質的新聞教科書中，已注意到運動新聞的重要性，但鑑於運動實為舶來品，短時間內尚無法成為獨立的專門新聞，甚至對採訪寫作時所應注意的事項也毫無置喙。運動新聞的特殊性，要在管翼賢（1943）編譯的《新聞學集成》中才發現。此書雖屬編譯，但從中亦可觀察當時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如何看待運動新聞：

大學校為主要的主持業餘運動的機關，它常常的向報紙供給很多的運動的新聞，同時每年畢業一批喜好閱讀體育新聞的人……。讀者以前對於業餘運動的興趣，現在已經推廣到職業運動方面。尤其是足球與冰球兩項。（管翼賢，1943：86）

這段對運動新聞的敘述，顯然直接翻譯自英美新聞學的教科書（中國當時並無職業運動），但重要之處在已體認運動成為報紙重要的新聞來源，而且觀賞賽事的運動迷也是銷售報紙時重要的顧客群體。此外管翼賢更注意到在球季休兵之際，報館主動舉辦賽事，創造假事件（pseudo-event），成為新聞報導的素材：

報紙的推銷部，常與體育版的同人組織球賽，報紙有了這個活動，就是在非球類比賽季節，體育消息缺乏的時候，仍可以有運動的新聞。（管翼賢，1943：90）

這種運動賽事與報紙新聞互為奧援的共生關係，在知名記者徐鑄成的回憶錄中有類似記載：

採訪體育新聞，如何下手？最初很徬徨。恰好，師大有體育系，當時有一位教授兼任華北體育協進會的總幹事，我去拜訪他，得到了熱情的支持。因為這也是互利，我獲得新聞，他的工作得到了宣傳。（徐鑄成，2009：51）。

引述所提之華北體育協進會總幹事為郝更生，當時任教於北師大體育系，與徐鑄成有師生之誼。而《世界日報》1933年6月所推出的《體育週刊》，編者黃金鰲本身即為知名運動選手，戰前是京大師範平民學校體育科主任，戰後為西北師範學院教授。無論是出自推廣運動，或出自專業背景而聘請為專刊編輯，顯然《大公報》與《世界日報》都已體認運動賽事與新聞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而民國時期的運動新聞，是否如英美報業不但成為讀者閱讀購買報紙的主要動機，甚至成為廣告商刊登與否的重要依據？由於當時不存在前引英國《新紀事報》的市場調查，報業發行稽核制度亦付之闕如，缺乏精確的統計說明運動新聞對報業廣告發行的影響。但從時人的片段回憶中，還是可以掌握梗概。例如以政論見長的徐鑄成，當時所服務的報社為日後以「文人辦報」著稱的天津《大公報》，但讓徐鑄成一戰成名的是1928年於太原所舉辦華北籃球賽的獨家採訪。

這場賽事受平津地區大學生與民眾的高度注意，由董顯光創辦並以運動新聞見長的《庸報》，《益世報》及《大公報》都派記者親

赴現場採訪。由於徐鑄成事先安排妥當，得以於午夜截稿付印前完整拍發賽事電報，並於次日清晨獨家刊出由南開大學奪得賽事冠軍的即時報導。因為這則獨家消息，讓不少《庸報》訂戶退訂，改訂《大公報》（李偉，2009：61-62）。徐鑄成即因這次成功的採訪工作，獲得重視而得到更多採訪重大新聞與要人的機會，而且徐鑄成並非特例。1933年第二屆全運會於上海舉辦，北平《晨報》與天津《大公報》分別派滕樹谷與章繩治採訪，兩人由於表現傑出而被上海《時報》挖角。上海《時報》對運動新聞向來重視，1930年於杭州舉辦第一屆全運會時，《時報》為與《申報》、《新聞報》和《時事新報》等上海報紙競爭：「包下飛機從上海運報，比其他報紙搶先數小時送至杭州發行。照片多、報導出色、讀者搶買；《申》、《新》等報則在杭州乏人問津，從此《時報》體育版一支獨秀。」（賴光臨，1981：110）當滕樹谷轉投《時報》後，更以誇大的手法報導該屆賽事消息（徐鑄成，1999：33）。

本文所分析的對象：《世界日報》，所以鵲然崛起於北平，除以多樣化的副刊號召讀者，另外就是提供北平文教人士眾多的教育及運動新聞。從這個角度分析，《世界日報》重視運動新聞，特別是校際競賽、區域競賽的新聞，乃著眼於廣大的學生市場，藉以吸引、購買該報。在研究範圍內所瀏覽〈體育界〉的運動新聞中，多數即為此類訊息：出賽人員、勝負結果與賽況描述等訊息。亦即《世界日報》所以重視運動新聞與商業化氣息濃厚的上海報紙相仿，也與英美通俗報紙一樣是出自市場與獲利的考慮，特別是《世界日報》於1933年底自行籌辦「世界日報杯」足球賽，更可視之為當代報紙在商業競爭壓力下，所採行的促銷活動，不但藉此吸引讀者訂閱，也在賽事冷清之際仍能常態性地生產新聞。同時期的重要報紙，如《大公報》、《庸報》、上海《時報》等報紙對運動新聞的報導也不遑多讓。以1935年的第三屆全運會為例，《世界日報》以兩版的篇幅，《申報》則以四版篇幅（第13～16版）、《時報》雖未標示特刊，但更以六個版面（第4～9版）的篇幅，大幅報導全運會消息。時任燕京大學體育主任的黃國安即認為：「民眾對體育之興趣大見增加，此係報紙盡量登載體育新聞、極力提倡之結果。」（世界日報，1934.12.22）。從報社不惜耗費鉅資投注於運動新聞的採訪工作上，到運動教育者的投書，都可證明運動新聞之於當時報紙的重要地位。

肆、1933 ~ 1935 年間《世界日報》運動新聞的內容分析

本研究選擇以北平《世界日報》為分析對象，乃著眼其代表性。根據國民黨中宣部於 1932 年的統計，當時北平地區銷量最多的報紙依序為：《益世報》，9,000 份；《商業日報》，8,700 份；《世界日報》，8,500 份（賴光臨，1981：95-97）。而據服務於《世界日報》人士的回憶，該報所以能在北平報業占有一席之地，關鍵之一是大篇幅報導教育新聞（吳范寰，1982）。由於北平向為教育文化重鎮，教育新聞中除教育政策外，也包含大量以學生為主的運動競技活動報導。且《世界日報》自 1930 年 11 月 15 日起，於報導教育新聞的〈教育界〉版，設置〈體育界〉此一專門報導運動新聞的欄位。

根據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所典藏的《世界日報》檔案中，現存最早一份為 1925 年 3 月 21 日的《世界日報》，其中第四版已經出現兩欄的〈教育界〉新聞。當 1926 年 5 月，《世界日報》增張擴編為八個版面後，〈教育界〉多數時間出現在第六版或第七版。當〈教育界〉成為《世界日報》的固定版面，〈教育界〉也衍生出專屬的次版面／專欄。1930 年 11 月 15 日，〈教育界〉版面中開始出現〈體育界〉的次版面／專欄，亦即專門報導運動／體育新聞的欄位，1931 年 4 月 4 日，雖然取消〈體育界〉的刊頭，但仍以顯著的「體育消息」標示歸納北平、中國地區的體育新聞。在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內，《世界日報》的版面、出版張數迭有更動（參見表 1），但〈體育界〉始終固定地出現於第七版。

自 1930 年 11 月《世界日報》將〈教育界〉與〈體育界〉兩類新聞並置於一版後，在可容納十欄的版面中，兩類新聞的比例即在 8：2 或 7：3 的比例間擺盪，〈體育界〉內的新聞多數為賽事結果或賽況報導。本研究逐日瀏覽登載 1933 ~ 1935 三年中，《世界日報》〈體育界〉中所報導的新聞內容為表 2。表格中的新聞項目，為該則新聞中所報導的運動類別，其中運動會與會議兩項，多數為報導籌辦狀況、參賽報名隊伍、人士，以及和運動、體育政策相關的會議訊息。在〈體育界〉所提供的賽事訊息外，《世界日報》從 1933 年 6 月 7 日起，每週三於第十或十一版上，另創〈體育週刊〉，此一副刊形式

表 1：1933 ~ 1935 年《世界日報》版面沿革

	1 版	2 版	3 版	4 版	5 版	6 版	7 版	8 版	9 版	10 版	11 版	12 版	13 版	14 版	15 版	16 版
1933.01.01 ~05.01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3 廣告 7	教育界 體育消息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 5 廣告 5	廣告	副刊 5 廣告 5	讀者論 壇廣告				
1933.05.02 ~05.31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消息	經濟界 本市新聞	本市新聞 副刊	副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副刊 廣告				
1933.06.01 ~06.16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消息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讀者論壇 廣告						
1933.06.17 ~08.16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消息	經濟界 本市新聞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副刊 廣告				
1933.08.17 ~10.07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消息	經濟界 本市新聞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1933.10.08 ~10.09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消息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讀者論壇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3.10.10 ~10.21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本市新聞	全運專刊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3.10.21 ~11.20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3.11.21 ~12.08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廣告		
1933.12.09 ~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廣告		
1934.02.15 ~02.21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廣告		
1934.02.22 ~05.23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廣告		
1934.05.24 ~08.31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廣告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廣告	讀者論 壇廣告	廣告

表 1：1933 ~ 1935 年《世界日報》版面沿革（續）

	1 版	2 版	3 版	4 版	5 版	6 版	7 版	8 版	9 版	10 版	11 版	12 版	13 版	14 版	15 版	16 版
1934.09.01 ~ 09.15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4.09.16 ~ 10.09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廣告
1934.10.10 ~ 10.15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華北運 特刊	教育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1934.10.16 ~ 10.31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副刊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1934.11.01 ~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大眾 公僕廣告	學生生活 公僕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廣告
1935.05.10																
1935.05.11 ~ 05.14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北平 春運特刊	廣告	教育界 各地新聞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大眾 公僕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副刊廣告	副刊	北平 增刊	廣告	廣告	廣告
1935.05.14 ~ 08.31	廣告	要聞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體育界 本市新聞	經濟界 本市新聞	大眾 公僕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廣告
1935.09.01 ~ 09.06	廣告	廣告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公僕廣告	大眾 公僕廣告	副刊廣告	副刊廣告	廣告				
1935.09.07 ~ 10.09	廣告	廣告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生活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副刊廣告	大眾 公僕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5.10.10 ~ 10.21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全運特刊	全運 特刊	教育界 體育界	各地新聞	本市新聞	學生 生活廣告	副刊廣告	大眾公 僕廣告	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1935.10.22 ~ 11.21	廣告	廣告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生活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副刊廣告	大眾公 僕、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5.11.12 ~ 11.30	廣告	廣告	要聞	廣告	要聞	婦女界 廣告	教育界 體育界	經濟界 生活廣告	學生 生活廣告	大眾公 僕、廣告	副刊廣告	廣告	副刊 廣告	廣告		
1935.12.01 ~ 12.31	廣告	廣告	要聞	要聞	要聞	經濟界	教育界體 育界	婦女界	學生生活 廣告	大眾公 僕、廣告	副刊廣告	副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933～1935 年《世界日報》〈體育界〉所報導的運動類別

新聞項目	則數	新聞項目	則數	新聞項目	則數
籃球	437	跳遠	23	足籃球	3
運動會	219	棒球	22	競走	3
排球	199	游泳	22	五項	1
會議	191	跳高	18	花式溜冰	1
足球	166	標槍	17	拳術	1
賽跑	80	鐵餅	17	馬術	1
網球	66	童子軍	15	毬子	1
國術	60	三級跳	14	跳繩	1
壘球	30	撐竿跳	13	檯球	1
田徑	27	鉛球	11	鍊球	1
跨欄	26	冰球	10		
溜冰	24	鐵球	9		
小計	1,7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不含人物專訪與特刊）。

的運動副刊，總共出版 17 期（至 1933 年 9 月 27 日止），之後以「編者事忙」為由而停刊（世界日報，1933.10.04）。

與常態性報導最新賽事結果的〈體育界〉相比，《體育週刊》較無時效性，著重於介紹運動知識、推廣民眾對運動的認識。但《體育週刊》的發刊旨趣，卻言簡意賅地說明《世界日報》何以重視運動新聞的原因：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值此國難方殷，凡我國民，必具強健高上之體魄，始能荷負發憤圖強高尚之重責，本刊第一旨趣即在喚起國人對於體育加緊注意，積極從事鍛鍊。吾國提倡體育，迄今已逾二十逾載，但成績疏鮮，且位能普及全國，本刊第二旨趣，即在研究體育理論及實際問題，喚起全國注意，以促其普遍發展。（世界日報，1933.06.07）

這段發刊宣言明確地指陳《世界日報》，乃至當時輿論界對待運動的集體想像，亦即運動有著強健體魄、抵禦外侮，故而亟需推廣宣傳、普及於大眾。而這也就構成中國運動新聞，不同於西方通俗化報紙所以重視運動，繼而陸續成為專門新聞分支與專業化表徵的發展動因。

一、運動與國族

1933年華北運動會開幕當日，《世界日報》的社論以生動具象的筆法，描述運動之於國家的意義：

吾華北健兒乎，努力向前！向前如賽球時之先鋒，向前如競走時之跑者，然後以擲鐵餅之精神擲炸彈，以揮標槍時之精神揮大刀，踰越障礙，則拿出跳高跳遠之神技，衝鋒陷陣，則拿出百碼萬碼之氣魄。吾華北健兒乎，努力向前，一洗從來被動之恥，只有向前才是生路，只有向前方能復我失地，完我領土。吾華北健兒乎，自助然後天助，其皆法1919以後德國之體育界，到處組織團體，指導民眾，使全國知兵，使全國成為軍國。（世界日報，1933.07.12）

這段引述不但清楚反映1930年代的社會輿論是如何看待運動之於國家的重要性，同時也呈現在內憂外患、國難頻仍的時代氛圍下，關於國民身分的想像與界定，不是在法律、政治權利等層面，而是透過敵我區辨中所確認的國族認同。對此時的中國人而言不是國民而是軍國民，而且是延續清末以降所亟欲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

男子們為了免掉「病夫」的綽號，都在體育尚努力；我們女子同樣是人，在依賴的卵翼下生存著，能不愧煞！我們也應當到運動場去，洗掉我們一向「病態美」的侮辱，不要讓男子專美。（王哲秋，1933.03.02）

無論是東亞病夫的論述，抑或民國初年的軍國民思想，都將國家比附為有機體，以疾病為隱喻，想像中國險惡的國際處境，而後藉具有強種健身的運動，而一改虛弱之國體、衰頹之國勢：

斯巴達從前的強盛，就是因為注意子女健康。他們說健康的母親，生下的男子能作軍人。中國人被稱為「整個人種不健全」，我想這和中國女子的不注重健康有很大的關係吧？所以我敢說：使女子注重健康，足以改進全國人民的健康，也就是強國之本。（藜青，1935.01.29）

這段文字依舊延續清末以降，中國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論述的影響，將國家興衰視為物種之強弱的反映。不只社會輿論如此看待，這時期的教育政策也以此一思維為主。1935年在《世界日報》針對讀者詢問何謂軍國民教育時，編者將軍國民教育的源頭溯自斯巴達的尚武教育，近代則舉日本仿斯巴達作為國制為例，強調日本舉國重視並獎勵運動。而中國則在甲午戰爭、庚子重創之後引入西洋政制，而開學校、習洋操。民國之後始重視軍國民教育，但積弊已深，外患頻仍，「欲救亡國圖存，仍只有一面忍痛，一面厲行軍國民教育。」（世界日報，1935.06.29）在第二屆全運會舉辦前，北平市政府通令社會局選派選手參賽時即明確地說明：

竊以丁茲國難，非舉國團結一致無以圖存，非振刷民族精神，無以救亡。歐洲各國自歐亞之後，對於國民體育提倡不遺餘力，蓋見於國家興亡係於國民體格之強弱也……。全國運動大會就教育價值上言，可以提倡國民體育、增進民族健康；在共赴國難方面而言，經此次全國各方之激勵，亦藉可以引起國人團結一致、奮發圖存之精神。（世界日報，1933.04.09）

原應於1931年舉辦的第二屆全運會，因九一八事變而延後至1933年舉行，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杰，利用開幕演講強調值此國難之際，舉辦運動大會不是貪圖逸樂，而是藉大會團結全民，鍛鍊體魄以復國：

全運大會，本定二十（1931）年舉行，因九一八事起，全國驟聞噩耗，如天崩地圻，無心及此，故爾停止。但此次仍然舉行，必非謂國難已過。其所以決然舉行，即正因國難較前更深，認為更不容緩。蓋欲解除國難，即首須國民有強健之體格，尚武之精神。1923，德魯登道夫將軍在德國運動會演說，謂復興德國，其責任即在全體選手之兩肩，今吾人亦願移此語，以贈全運會，即挽救國難，收復失地，其責任即在全運會全體選手。（世界日報，1933.10.07）

類似的論調，反覆出現在全運會主事者的公開言論中，藉由開閉幕活動，宣揚運動與國力的必然性，以及強身健體的重要性。例如汪精衛在第二屆全運會開幕時，聲淚俱下地痛陳東三省的淪亡（世界日報，1933.10.11）；閉幕時東北諸省選手臨行前聲淚俱下地發表感人肺腑的告同胞書（世界日報，1933b.10.20）；第三屆全運會的籌備主任吳鐵城更認為現代體育的意義端在國防與生產，而非當代視體育為休閒娛樂之重要活動（世界日報，1935a.10.11）。最高領袖蔣介石更藉全運會開幕，重申運動之於國家的重要性：

運動之目的，在求各個人身心平均之發展，以造成健全之體格，強毅之精神。競賽之目的，在求於有規律的動作之中，以養成手紀律，尚合作，及勇敢，服從種種德性。此皆切合吾國民族當前病態之良劑，故促進運動，不應僅限於學校，而應普及於社會，不應專崇個人之特長，而應淬勵全體國民之進步，復興民族之基本工作，是固最占重要。（世界日報，1935b.10.11）

這些公開的官式演講，無疑是企圖在充滿省際對立的競賽，或在蜂湧而至只為一睹運動明星的民眾面前，進行難得的機會教育，宣揚一致對外、收復失土及生死與共之命運共同體的重申。在第二屆全運會結束後，《世界日報》於副刊〈明珠〉刊載題為「運動會」的時評，更能說明這種集體意識：

同時有另一方面也在準備著運動會，這個會的範圍應當包括全世界。這個會的競賽不是赤手空拳的跑跳，也不是普通的標槍鐵球鐵餅，這會的競賽是飛機、大砲、海艦、坦克車。這個運動會的開幕日期不遠，可以在前天德國的退出國聯及裁軍會證明。中國應該怎樣呢？差不多誰也不操心。依我想，不是把中國畫作田徑操場，便是將中國分做數塊供人拉糞撒尿。（世界日報，1933.10.22）

這篇短評具體而微地將競爭性質的運動會比喻為國際競爭，各類運動競技類比為軍事科技。這樣的現象不獨中國，即便英國在國力鼎

盛之際於 1908 年舉辦的倫敦奧運，英國輿論界也不免試圖以此一運動盛會測度帝國之興衰（McIntire, 2009）。實際上，歷次全運會也成為國民政府向民眾宣傳愛國主義、國族主義的最佳時機。於是，一般大眾也在輿論與政策的引導下，將運動與收復失土、一洗國恥的重責大任畫上等號。一位讀者在《世界日報》的〈讀者論壇〉上這樣表明對運動會的期許：

我政府當局，對於體育之提倡，仍不遺餘力。所以積極籌備，華北運動會得照舊舉行，政府對於體育如此重視，無非是欲使華北同胞，振奮精神，為國干城而已……。此次閉會之日，亦即東三省淪陷，察綏告急之時，望與會諸位健兒，以比賽時之精神，去抵抗暴日。則不但失地可復，即與歐美並駕齊驅，亦指日可期矣。（張守約，1933.07.20）

二、運動與大眾

從這些文獻來看，1930 年代《世界日報》的運動新聞顯然無法自外於國族主義的浪潮，甚至更充當起鼓吹軍國民思想的重要旗手。舉辦運動賽事除此鼓勵民眾操練身體，改造民族體質，也藉以宣揚愛國主義，甚至藉運動所強調的合作與紀律，對民眾進行社會規訓。但在強國強種的時代潮流外，《世界日報》也流露出不同的言論與主張。1934 年華北運動會閉幕後，《世界日報》以短評的方式，評論該屆運動的缺失：

馴至所謂運動者，竟變為職業，而非所以提倡體育；大多數國民，皆與運動無直接關係，而所謂選手者，則一專門職業家也！是豈創設運動會者，始意所及哉……。運動職業化之結果，致力於運動者，或不免荒廢其學業，致身體雖健康，而莫知如何用其健康之身體，乃可以致國家於強盛，斯誠大可哀矣！（世界日報，1934.10.10）

固然在《世界日報》編者的觀念中，是以國族為上位概念將運動

與國運及國力作直接關連。但在國族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下，卻也關注一國之內因社經地位之不同，而產生對運動的不同運用方式及分化。特別是針對的是運動賽會中充斥少數運動明星，淪為少數學生所從事的特殊活動：

全運會應求名實相符：既曰全國運動會，而參加者，可不待考其實際，知必除少數兵士外，多係學生，在今日情況下，固有可諒之理由，然欲求諸實際，則應極思有所補救，俾全運會之名稱符合。（黃金鰲，1933.10.10）

而到該屆全運會閉幕時，署名關容（1933.10.21）的作者在《世界日報》發表對下屆全運會的期望依舊強調此點。認為參與全運會的選手九成都是學生，而能夠參與的學生，在學生群體中更屬鳳毛麟角，全國中僅此少數人口從事運動，實難達到運動救國的目的。《世界日報》的立論並非獨排眾議、標新立異，而是契合於民間輿論的表現，這可以從《世界日報》的讀者投書得到印證：

固然我們絕不是反對提倡體育，也絕不願這些少爺小姐，仍為賈寶玉、林黛玉式的多愁善病，不過這種武狀元的辦法，不能不令我們懷疑。我們且問每校的選手是全校的百分之幾？充其量，假定是百分之十吧，那麼除下的九十人呢，就被犧牲了（在體育上）；而這十個選手呢，也就因為要做學校體育的裝飾品，其他的功課就不暇充分顧及了。（楚人，1934.10.17）

運動普及於大眾的訴求，就是希望推廣運動使之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休閒活動，而非僅限於特定時間：運動會；特定空間：運動場；特定人選：選手，所從事的活動。鼓吹運動大眾化的立場，也讓《世界日報》刊登建議將全運會經費，挪為建設各省市公共體育場的讀者投書（世界日報，1933.09.12）。而且對於運動選手「職業化」的現象，也引起讀者的注意，例如《世界日報》的〈讀者論壇〉，曾刊登題為〈反對運動選手制〉（際華，1933.04.04）的投書，文中指

出北平某校體育部收入的 1/3 乃是支應於選手費上，不但讓運動選手在校內成為特殊階級，也相對剝奪其他運動項目的支出，投書者並主張：「節制運動的浪費、剷除運動員階級、永久反對選手制。」

因此，以體育社會化、運動大眾化為號召而舉辦的「世界日報杯」足球賽，更強調必須將運動擴及於庶民大眾的必要：

本報此次舉辦公開足球賽，即欲有以矯斯弊。言其意義，厥有二端：第一，向來舉行運動比賽，莫不直接間接，依賴政府機關之提倡與援助；而參加運動比賽者，又僅限於一部分學生，此體育之所以不能普及於社會也……。第二……，本報今日之舉，即在打破學校與城市之限制，不論城市工人，鄉村農民，皆可參加，一無限制……。總之，本報此次舉辦「世界日報杯」公開足球賽，志在提倡，並促現運動大眾化，體育社會化，以收強國健種之效。（世界日報，1933.12.10）

在這篇宣言性質的文稿中，明白指出由於當時參與運動人數有限，而且多賴政府機關主導相關活動，因而無法藉從事運動而達強國健種的終極目標。在 1933 至 1935 年，分別舉辦過第二屆全運會、第十八屆華北運、第三屆全運會，針對這三場運動盛事《世界日報》均曾發表社論評述運動會的成敗，並具體提出建議主張^[2]。1933 年的社論強調三點：(1) 不宜過分獎勵運動會之競爭，至變成一種畸形之發達；(2) 與其專門化、技術化，毋寧普遍化、社會化；(3) 訓練團體行動之機會，而非刺激、鼓勵反團體性。1934 年的評論，則提出三大主張：「普遍化的體育」、「勞動化的體育」與「羣化的體育」。1935 年的社論延續《世界日報》的一貫基調，力主體育的集團化與社會化，否則無法藉此建立民族復興基礎的舉辦宗旨。這幾篇在特定大型賽事舉辦之際發表的社論，針對的是推廣運動後產生諸多流弊而生的批評：

夫舉行運動會之意義，原在提倡體育，強健國民，並以養成團體活動之習慣，孰能謂其毫無價值乎？惟是末流之弊，盡

失本來意義，非特未能強健國民，反因運動過度，適足戕賊其身體；非特未能養成團體活動之習慣，反因爭一己（或一團體）之勝負，不惜破壞團體道德。馴至所謂運動者，竟變為職業，而非所以提倡體育；大多數國民，皆與運動無直接關係，而所謂選手者，則一專門職業家也！是豈創設運動會者，始意所及哉！？（世界日報，1935.10.20）

換言之，儘管國民政府透過教育課程、舉辦全國性賽事推廣運動，但在《世界日報》的編者看來，從事運動競賽不但未能從中習得團體合作之效，反而更加激化團體（各省）衝突。被視為運動精神的「更高、更遠、更快」的錦標主義，也導致為求成績而淪為少數選手所從事的菁英活動。實際上，該如何將運動普及於大眾，不只媒體關切，政府當局也注意到推廣運動過程中參與運動者僅限於就學人口的不足。1933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即通令各地教育局，應當「普遍提倡體育，注意團體運動」，因為：「各地運動會，亦多注重以比賽為目的之體育，甚有一二擅長體育技能之學生，平時對於其餘各課，可不修習。學校方面，因希望其奪錦標，往往特予優容。」（世界日報，1933.04.28）

執中國學術牛耳的北京大學，在1935年新學年度開學之際，更改運動教學方式，不但聘任多名專任教師組成體育委員會，規劃各院所運動教學與活動。而為避免形成少數學生運動明星，更取消各院運動代表隊，校隊組織也暫緩辦理（世界日報，1935.09.15）。在輿論界的推波助瀾下，《世界日報》（1935.01.01）於回顧1934年運動界大事的專文中指出，各界人士不但於「公暇之餘從事運動，全國各地業餘運動團體，相繼成立，滬市並曾舉行工商聯合運動會，實肇運動普遍化之先聲。」在各界的倡導下，1935年第三屆全運會開幕活動中所出現的各式官式宣言中，政府當局都明確意識到運動普及化的必要性：

體育普及化一說，年來各方均力加宣傳，已為盡人所知，當局方面，亦屢有表示，引以為己任，但事實上尚無何種設施，故國內體育仍未普及，此吾人所引以為憂。刻政府最高當局，均已注意及斯，則今後亟應上下協力，一掃徒有

空言之惡習，著重實際，務求能從速促使普及，則庶幾藉體育以建立民族復興基礎之目的，得以達到也。（世界日報，1935b.10.11）

將運動普及大眾的主張，同樣反映在 1934 年《世界日報》刊登來自蘇聯《塔斯社》的譯電：

蘇聯之體育團體，現包括六百五十萬人。蘇聯對於體育極為注意，在任何學校中，體育為課程之一部，所有大多數工廠及公所內，工作前或休息時間時，必有專門導師，指導工人雇員之體操。蘇聯運動界之激進，實較任何事業為顯著……。在蘇聯一切運動，經常有專門體育醫生，及富有經驗之導師，在旁監視。全國專門訓練體育導師之大學有四處，專門學校有二十一處，現已畢業者，已達萬人之多。（世界日報，1934.01.16）

譯電內容的重點強調蘇聯人民參與運動的人數，以及政府對推廣運動的重視及專業化的快速進展，而並非強調無產階級應發展特定的運動項目或者形式，也就是所謂「勞動化體育」。但什麼是「勞動化體育」？

今日之體育方法，惟有閒階級始需用之，勞動者則不需要。何者？勞動者終日勞作，手足不停，其身體自然堅如鐵石，固無所用其玩球，賽跑或跳舞之類，以助其腸胃之消化也。今日流行之運動方法，多為消耗的，若無一定適宜之場所，即無法開始運動。而勞動化之體育，則多為生產的或衛生的，且其方法，簡而易行，即家庭瑣事，倘能親自操作，即可達到上述之目的。經濟而有益，可云兩得其利。（世界日報，1934.10.12）

從「勞動化體育」的主張可以發現，在 1930 年代的中國，運動此一休閒活動有著明確的階級差異，從事運動的人僅限於編者筆下的

「有閒階級」，因此如何突破階級限制而將運動普及於所有人，是這時候《世界日報》所以主張運動大眾化的關鍵。但這裡的大眾乃是相對於少數菁英的其他人群，並且是為了強國健種、繁衍生殖、擺脫恥辱的國族大眾。

三、運動之用

根據上述《世界日報》關於運動大眾化的評論，眾多作者所希望的是能夠將參與運動的群眾範圍，由學生擴及一般民眾，以掃除過度凸顯個人的英雄主義外，也特別關切如何提供一般民眾所能負擔的運動設施。許慧琦（2008）根據 1935 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將當時北平主要旅遊場所的入場票價整理為表 3。

從表 3 的整理中發現唯一屬於運動空間的中南海游泳池，票價遠高於其他公園休閒設施，甚至接近性質屬於博物館的公共設施，而倘若真要下水大展泳技還得另外付費。因為門票之高昂，引來民眾投書表達不滿，以能否進入游泳池而引申為階級之不平等等：

原來游泳池也是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一些有錢人們的專有獨享的娛樂，這裡也是有階級的區分，身分上的限制啊！由此證明了楊秀瓊之所以能處處受歡迎，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她是小姐，假使他處於歌女或一些窮了頭的地位，就得不到委員大吏們的重視與歡迎，因為根本不准你入游泳池，你就是有

表 3：1935 年北平重要遊覽場所票價

場所	入門券票價	場所	入門券票價
中山公園	銅元 20 枚	市民公園	無
北海公園	銅元 20 枚	孔廟	銀元 4 角（銅元 184 枚）
中南海公園	銅元 20 枚	故宮	銀元 5 角（銅元 230 枚）
天壇（外壇）	銅元 20 枚	雍和宮	正券銀元 4 角（銅元 184 枚） 副券銀元 2 角（銅元 92 枚）
天壇（內壇）	銀元 3 角（銅元 138 枚）	頤和園	銀元 1 元（銅元 460 枚）
城南公園	銅元 12 枚	中南海游泳池	門票銀元 1 角（銅元 46 枚） 游泳費銀元 4 角（銅元 184 枚）

資料來源：《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頁 135-136），許慧琦，2008，台北：學生書局。

絕頂的游泳天才，那裡去練習？所以在這種社會裡，一切的一切，都是以富有者為主體的，否則休想露身手獻技能。（弓矢，1934.08.09）

為促使運動大眾化得以實現，《世界日報》注意到如何降低民眾使用運動設施的門檻，讓更多平民群眾得以負擔當時顯然不評價的費用。而且這時期《世界日報》所鼓吹的運動大眾化，不僅試圖向農工群眾推廣西方現代運動，也將目標指向婦女群眾：

我國大多數的女子，只知擦胭脂粉掩飾她們體格上的弱點，我國所以被譏為遠東病夫，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了。所以為了取消「遠東病夫」的名稱，鄉間婦女的體育現在也應該注意的。（樹芳，1933.12.30）

從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在《萬國公報》上主張中國婦女廢除纏足陋習開始，中國革命的關鍵論述之一就在中國人的身體必須被改造以適應列強競爭。當中負擔傳宗接代的女性身體更是被關注的焦點所在，但即便是接受現代性別思維所啟發的新女性，已經意識到經由強身健體以改造自身，仍須面對自身女體如何在公共空間中呈現的非難。例如〈婦女界〉上曾登載一封讀者來函。投稿者為新婚女性，婚後仍試圖保持過去就學時養成的運動習慣，經常於清晨時在庭院中作甩手、柔軟體操等運動。但此舉卻引起鄰居的旁觀議論，使投稿者頗感不自在，因而感嘆現有公共運動設施不夠普及，或者是收費高昂而讓人怯步。這位讀者因而建議：

聽說市當局已積極籌備公共體育場之建立，這是十分需要的建設。我們希望它及早實現，不過總應普遍的去先建設小規模的體育場，因為如果只建立少數大規模的運動場，貧苦的人因為距離遠，時間少的關係，一定不能十分方便！（汪欣，1935.03.01）

在性別意識尚未充分普及的 1930 年代，中國婦女從事西方現代運動的正當空間就在學校，一旦離開學校任何自我鍛鍊的運動方式都

難以逃脫窺探的異色眼光，運動大眾化的另一個意義也就在提供婦女正當合法的活動與休閒空間：

我們常常想，怎樣可以叫一般婦女都有運動的機會，怎樣可以叫婦女永遠有運動的機會，而不是一離開學校就與運動絕了緣。多建設公共體育場。比方像在北平，至少東西城各建一個，自可增加女子運動的機會。（秉英，1933.10.23）

儘管《世界日報》作此議論，但實情應如游鑑明（2009：251）所發現的，這時期的運動會是展示體育教學成果的場所，經由女性運動員的比賽，社會大眾得以看見女子體育的發展。報刊媒體不僅藉運動會宣傳女子體育的重要性，同時為爭取銷路更將報導方向著重於場內外的各種花邊新聞。這現象同樣可在《世界日報》幾次運動會特刊中發現，特別是在場外花絮等欄位中看見女性運動員與女明星的花邊八卦新聞。因此，問題也正如許多當代女性主義者所關注到的，媒體報導中的女性圖像往往以男性視角出發，將女性客體化為被動的凝視對象。

資產階級的有閒者頑的花樣真不少，尤其是玩弄女性的手段，委實高明的很！提倡「健美運動」便是其中的一種……。我們要知道人體美的攝影家，高呼「健美的提倡，是婦女解放第一要素。」那正是把被壓迫被蹂躪的女性糟蹋得半個錢不值！他們攝的「人體美」，只是在極力的促進資產階級的有閒者，消極的滿足他們肉慾的刺激。積極的則是作為生育製造的器具，以作其戰爭底犧牲品而已。（恬冰，1934.09.02）

受限於時代條件，這些出現於《世界日報》上的評論，顯然不認同運動的獨特性，依舊將運動的社會意義侷限於再生產的領域，不認為運動乃至休閒有自成一格的特殊性，並且將運動等同於「有閒階級」專屬活動。《世界日報》的社論也同意運動無非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普羅大眾終日奔波、汲汲於營生，何苦在整日勞動後還要自討

麻煩？但這不意味著當時的中國不存在藉運動彰顯獨特地位的使用，當中特別是當時青年學子所喜好的溜冰運動：

按事實來說呢，溜冰的確也是一個好的運動，可是現在呢？差不多已經失掉了他的真實意義了，有些個男女們，他們都不是為運動而溜冰，不過借著這個名目，作為兩性交際的途徑而已，因為溜冰在目前的北平，是被認為時髦的事了，再加以北國冬季的特別美景，所以摩登男女，趨之若鶩，而就形成了上述的情形。我們應當從速把這點錯誤糾正過來才對呢。（世界日報，1934.01.25）

文章所批評的對象就是不將運動當一回事而來的議論，因為從事溜冰運動的青年將此一活動作為男女社交場合、迎合潮流的時髦玩意兒，而非自我鍛鍊的身體塑造。甚至也有讀者投書表示，溜冰的婦女不應濃妝艷抹（紫，1934.02.08）毫無疑問地，對評論者而言從事運動的目的同時也是運動行為的正當性就在救國，其餘一切都顯多餘，這也正是評論者所批評的重點所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休閒娛樂，被 Terry Eagleton（1981）認為是對社會生活規範的合法逾越，這些非勞動工作時間所從事的活動，無非是為了維繫勞動生產與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從這觀點來看民國時期的運動，運動所以必須推廣，在於強健體魄有助陣前殺敵，促使中國脫離病夫之難堪。任何脫離此一目的的運動，都被視為無異身心健康。

四、綜合分析：運動救國的新聞

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時間裡，中國正不斷遭逢日本的侵略，但國人是否真的上下一致體認到此乃空前之國難？《世界日報》創辦人成舍我（1938 / 2013：184），在戰爭爆發之初就已發現：「抗戰十月，儘管我們失去了許多重要省市，死傷了若干萬忠勇健兒，而離開戰區較遠的內地，簡直還彷彿不知道有什麼抗戰，為什麼抗戰。」顯然在成舍我避難途中所見之各地國人，並未深刻認識到國難當前的嚴峻局勢。及至戰爭後期，成舍我（1943 / 2013：230）認為這一現象只是更加嚴重：「固有的報紙，在此時期，卻因種種因素，其銷行處集

中於都市本身，其對象愈集中於少數公務員及知識階級。報紙下鄉，仍只被視為一種空泛的理想。老百姓沒有盡量普遍受到抗戰宣傳的洗禮，其渾渾噩噩的情境，由我這一年中兩次的旅行所見，比抗戰初期還要加甚。」為此，成舍我提出「平價報」的主張，固然是企圖藉由削減報紙售價得以通行於普羅大眾之間，但究其動機是將報紙視為宣傳工具，動員尚未知悉戰爭情勢的大眾投入於國家動員工作中。這樣的動機，明顯與西方報紙為爭取廣告刊登、增加獲利，而以降低售價為手段，實為擴大讀者或消費群體的目的不同。

本文所分析《世界日報》的運動新聞，乃至同時期中國其他報紙中的運動賽事報導，起初的確深受西方專業化新聞的影響，以吸引讀者目光而得到主事者的重視。這不但可從《世界日報》同仁的回憶得到證實，表 1 所整理 1933 ~ 1935 的版面沿革中體育版已成固定版面的事實，也可說明報紙對運動新聞的重視。除此外，維持近三個月的《世界日報》《體育週刊》，內容以推廣運動常識、新知、倡議運動價值為主（參見表 4）。藉運動改變國家處境、強化國民體質、與列強爭勝、洗刷國恥，並非編輯重點。而且在本節分析的新聞與評論中，部分作者也已關注由於運動之不普及，導致運動賽會成為培養運動明星的實機，也造成運動淪為都市少數學生菁英所獨享的活動，甚至演化為青年男女的社交活動。

換言之，運動在中國本土的發展中也出現多元的實踐形式。這些多元實踐包括國家藉身體規訓而行治理，進而以此文明化想像作為解決個體、群體乃至國家間爭執的手段。但在這種強烈的國族使命外，前所述述的讀者投書與報導，也看見作者強調運動大眾化以反對菁英主義，重視業餘主義的主張。這些文本雖然是以批判的角度評論溜冰、游泳成為權貴人士階級化的休閒活動，但若反面解讀這些批判，也證實這些批評者已觀察到 1930 年代在中國民間的運動行為，已成為部分人士凸顯地位尊貴，與強身報國無關的社交或炫耀性活動。

文化史學者 Huizinga 與 Caillois 主張，現代運動起源於初民社會中的遊戲（play），遊戲本身是無須任何目的的生活方式，遊戲也不會帶來任何實質上的利益，是非生產性的活動。運動史家 Guttmann（1978）認為遊戲、運動是由於初民社會中，為滿足神聖與世俗區分之所需而生，是凝聚集體的儀式、不具功利性的神聖活動。儘管時代演變，在西方中世紀的嘉年華會，或本地社會仍舊存在的廟會節慶，都是原始

表 4：《世界日報》《體育週刊》所刊載文章

期數	文章	期數	文章
1	發刊旨趣	10	歷代名哲之體育健康談（續）
	體育教育上的切要問題		遊戲精神
2	田徑運動	11	歷代名哲之體育健康談（續）
	田徑運動（續）		縱談黑龍江省現時代的體育教育
3	體育價值的客觀證據	12	介紹華北體育通訊社簡章
	體育價值的客觀證據（續）		檔案缺漏
4	對於提倡踢毬比賽幾點貢獻	13	中國社會體育孔亟的需要
	體育價值的客觀證據（續）		體育與軍事訓練
5	對於提倡踢毬比賽幾點貢獻（續）	14	各種運動計分法
	體育價值的客觀證據（續）		女子在行經期間不宜絕對停止體育活動
6	對於提倡踢毬比賽幾點貢獻（續）	15	中國社會體育孔亟的需要（續）
	遊戲日（新的運動會）		各種運動計分法（續）
7	對於提倡踢毬比賽幾點貢獻（續）	16	摩登體育的澎湃和前途危險
	指導員的資格		參加北屆平市夏令公開排球賽以後
8	體育與健康之價值	17	各種運動計分法（續）
	遊戲日（新的運動會）（續）		女子在行經期間不宜絕對停止體育活動（續）
9	對於本屆華北運動會之幾點批評	16	摩登體育的澎湃和前途危險（續）
	田徑運動（續）		各種運動計分法（續）
9	體育與健康之價值（續）	17	運動傷患底防範與處理
	歷代名哲之體育健康談		女子在行經期間不宜絕對停止體育活動（續）
	本屆華北運動會閉會後之感言		各種運動計分法（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遊戲的轉型。現代運動的誕生與擴散，先因國族主義對「被發明的傳統」的需求而被重視，稍後又受資本主義的青睞與媒體結合為「運動／媒介複合體」（sports/media complex）。但存在於日常生活中，這種不為營利、別無他求的集體性、原始性的運動始終存在，進而發展為西方社會中，不受國家控制的市民結社的重要形式。西方社會運動組織的自主發展，絕非一蹴可幾，但此時中國受嚴峻的國際情勢所限，使得清末以降引進中國的現代運動向國族化的集體意識傾斜。

分析《世界日報》運動新聞的報導可以看到，無論官方宣言或讀者投書都將運動賽事比擬為國際競爭；將運動視為團結中國對外、激

勵人心的公共集會；也將東亞病夫之體質衰弱想像，投射為賽場上必須精實鍛鍊、奪取佳績、一掃恥辱的國族積怨。論者所以倡導運動大眾化，或倡議興建平民運動場所，其目的終究脫離不了運動的救國目的，除此之外運動即無存在的正當性。因此，當溜冰成為摩登男女的社交活動後，《世界日報》的作者即大肆撻伐；楊秀瓊等運動女明星成為社交名流後，也以「資產階級」的病態美斥之為無物。而忽略運動與其他民間活動一樣，是源自民間的自主社交網絡活動，透過定期的運動集會而產生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連結。這點在西方各類運動俱樂部、球會等組織中，都可清楚地發現其積極意義。

依 Carey (1997: 314) 的論點：「文化是一系列的實作，藉由這些實作而將秩序加諸於混亂之上，而這些實作首先構成為傳播，再透過儀式使人們進入到社會關係的形式之中。」換言之，新聞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傳遞這種社群過程 (communal process)，而這也是一種儀式過程，一種公民宗教的形式。報刊雜誌上對新聞事件的修辭、用語，乃至如何框構 (framing)，也就決定讀者將進入、參與何種集體儀式。如 Tuchman (1978) 與 Gans (1979) 的研究所示，媒體的框構作用是依據特定價值而決定新聞如何被呈現，也產生正當化既定社會規範的效果。因此，運動的媒介敘事是讓運動事件產生意義的關鍵方式，並讓這些關鍵的運動事件與更廣大的文化意義叢結產生關連 (Kennedy & Hills, 2009: 75)。

新聞、報紙文本不可能獨立於社會文化脈絡存在，而是一種由分享共同文化價值體系的個體間的對話。新聞報刊不只是每天發生事件的流水帳，新聞報刊更創造公眾與私人關注的焦點事件，也將這些事件擺放在社會文化脈絡中，不但解釋事件也推斷事件的影響。Trujillo & Ekdom (1985: 264) 因而認為運動新聞的寫作也是意識型態的，運動新聞的作者呈現被文化價值體系中所肯定與接納的社會共識。在本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世界日報》的記者運用愛國主義的修辭描述、形容運動場上的競爭，同時又將此一修辭轉化比擬為國際情勢。關鍵是，這套修辭必須被閱讀報刊的讀者大眾所肯定與接受，記者編輯與共同體的成員一致地參與、完成這個集體儀式並強化國族的集體認同 (Kitch, 2009: 30-34)。而且這一共同體又不是無邊無際無法想像的，透過國際賽事、與外籍人士競技的報導，也不斷地強化確認誰是國人、誰是異族，甚至這樣的區分方式，也導致省際衝突的緊張情勢。

儘管分析的是文本作者對國家存亡的焦慮、運動救國的期待，而未觸及讀者反應。但在任何文本創作之前，作者必然預設、想像某種形態讀者的存在，並依此而書寫，因此任何作品必然包括讀者在內，而這也是何以 Anderson 論述想像共同體時高度重視印刷資本主義帶來的影響。在 Anderson 對想像共同體的探索中，認為關鍵在於透過新聞報刊，共同體成員得以超越時空侷限，體驗無法直接觸及的事件。藉由報刊此一現代媒介，傳統共同體的想像被維持，閱讀大眾得以分享共同的社會想像，而建構屬於自身的集體認同。於是經驗得以共享、敵我得以區分、國族得以凝聚，現代報刊成為動員與形塑國族個體的主要動員機制（黃順星，2011：197）。

伍、結語

西方現代運動的興起，自始就與帝國主義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息息相關，都企圖藉特定運動傳統的建構與傳佈，創造自我國族的身分認同與想像。但也不可忽視在西方內部現代運動的發展脈絡中，市民社會特別是媒體對現代運動的擴散所扮演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各類運動項目的自治團體，經由定期舉辦賽事、建立明確規則而逐步確立相對於其他場域的自主空間；另一方面媒體特別是專門的運動報紙、雜誌等出版品，藉由對這些日益頻繁出現的運動事件及運動明星的報導，爭取可觀的讀者及龐大的廣告商機。例如英國《每日郵報》是 1930 年代高爾夫球在英國成為主流運動的重要推手；1896 年現代奧運在雅典展開前夕創刊的義大利《運動報》，成為自行車運動的主要推廣者；法國的《隊報》在 1903 年舉辦環法自行車賽，至今歷久不衰（陳子軒，2010.05.29）。

Williams（1976）回顧傳播工具在當代擴張的歷史後，認為這樣的發展經驗提供兩個啟發：一是讀者受眾人數的增加，促成使用傳播工具與消費傳播內容人口的擴大；二是由於傳播工具的擴大使用，導致傳播產業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所生產的內容皆以獲利為主要思考邏輯。運動新聞以及更廣義的通俗新聞，所以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成為英美報業主流，正在其新聞類型、報導方式、故事類型，更容易吸引大眾目光，進而吸引廣告刊登、增加獲利。但 Williams 也提醒後人注意，在資本主義的獲利動機下所衍生的婦女、兒童、勞工

等專門新聞或刊物，也象徵著西方社會朝向更多元的方向發展，構成不明顯但卻極端重要且漫長的文化革命。女性、兒童、勞工乃至少數民族的移民報刊的出現，對於這些少數群體形成認同與行動乃是重要且必須的溝通工具，同時也對現代新聞的專業化發揮重要的功用。

反觀民國時期的報業發展，無論從業者或學者，皆大量地吸收英美報業的理論與實務，對西方、英美報業的發展過程自不陌生。以這樣的角度觀察民國時期的報業，的確曾出現類似的榮景，這也正是引言中論者主張民國報業為近代中國報業的黃金年代的理據。例如《世界日報》所自行舉辦的足球賽，不但能夠為所屬報紙提供穩定的新聞來源，也能激起讀者閱報、購報的意願。在徐鑄成（1999：33）的回憶中也可看到當時知名的運動記者，是以何種手法吸引讀者：「其拿手傑作，為將打破大會多項全國紀錄之游泳女將楊秀瓊賜名諱『美人魚』，每日刊載大幅照片，並每日刊出楊秀瓊之『起居注』，這樣的『噱頭』一時很能迎合部分讀者的低級趣味。」而《世界日報》所強調的運動大眾化，一方面在於當時運動人口僅限於少數人口特別是青年學子；另一方面針對競賽而生的英雄主義甚至職業主義而生。相對於這種被批評為有閒階級的運動，《世界日報》也提出屬於勞動階級的勞動化體育。從這些對不同的運動使用方式的建議與評論中，可以發現當時評論者已注意因經濟差異，導致階級間從事運動行為頻率與難易的差異，甚至也關注到性別與階級區分的意涵。

但這些只是表面上的相似，現代運動引入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有關，甚至帶著濃厚的慈善開化的文明意涵。特別是清末以降受盡屈辱的民族情緒，及被冠之以東亞病夫的稱號後，運動就不只是強身健體之用，更是民族整體擺脫被殖民以圖強的出路。這不但可以從教育政策的演變上獲悉，從新聞報導中也能清楚觀察到藉運動以強國、救國的企圖，視運動場上的勝敗為國家之榮辱。當 1930 年代國民政府的統治漸趨穩固，加上 1931 年九一八事變，運動作為振興民族的意義就更為強烈，藉由定期舉辦全國賽事，配合為求謀利的通俗報紙的大幅報導，此一意象更深入人心。透過對《世界日報》運動新聞內容的分析，不難看到民國報業發展的主旋律是在共赴國難、擺脫民族恥辱的政治動員下，以國族的身分號召群眾從事運動，藉國民體質之改造而轉變中國之國勢。

遍觀這時期《世界日報》上關於運動的評論、投書與新聞，都可發現作者強調的不是選手如何藉運動實現自我，而是延續晚清以降士

人賦予運動救亡圖存的重責大任，中國的運動組織與參與人口，始終難以如同西方運動組織或人口，成為相對於國家之外而獨立自存的社會領域。而且在以運動新聞為分析主題的本研究中發現，此時中國報業雖然也亟欲大眾化，但並非朝向西方社會中的分眾多元受眾概念發展，而是以國族為號召而行之。亦即，民國報業的通俗化、大眾化的方式不是階級、性別、種族或其他社會類屬，而是普遍化、抹煞差異的國族。換言之，透過運動新聞的報導，不但創造敵我之分，也進而凝聚共同體的認同。文化價值、歷史傳統乃至國族認同，就在分享訊息、閱讀報紙的過程中一再地被確認鞏固。中國作為一個能夠被想像為真實的共同體，正是藉著閱讀由共同語言所書寫的報刊才得以具體化，共同體也在日復一日閱讀晨報的活動中成為我族同胞所共享的集體儀式。

這樣的發展路徑，當然是受制於國家情勢之不得不然，這裡並非以後見之明，批評前人之非。如同張詠（2013）對中國留學知識分子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他們雖然深受美國自由主義洗禮並深知新聞自由之要義，但返回中國後深感國際傳播之扭曲與不平等，以及欲借國際傳播而扭轉國際局勢，於是放下自由主義之信念，轉而投入國民政府從事新聞檢查與國際宣傳等與新聞自由理念相違逆的工作。這是前人在不同的國際局勢與國家處境中所做出的艱難抉擇，但時至今日，局勢變遷，為何依舊以國族觀點報導、評論運動？台灣傳媒近年不斷以「台灣之光」形容王建民、郭泓志等人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成就、中國媒體對姚明、劉翔的推崇、2008年對北京奧運盛大場面的頌揚，更是重複播頌國族榮耀的主調。運動大眾化、社會化的目的究竟為何？是犧牲個體以榮耀國族集體，抑或從市民社會的立場，看待運動與社會文化的自我維繫與團結。

曾任武漢大學體育副主任，後留學美國春田大學（Springfield college）專攻體育行政的劉昌合（1935.07.30）在當時就認為：「社會事業之發展至鉅且繁，事事仰給於政府，則有限之帑，辦無窮之事業，勢必有所不能。若候政府有餘力而後舉辦，必至徒耗時日，永無發展之望。」固然，時局所限不得不為，倘若今日從事運動新聞報導者，仍舊無法理解運動本身所具備的社會文化意義，專業的運動新聞勢必難以立足，而報業也難以超越國族侷限，以不同的社會分化方式，開啟一種新的看待大眾的視野。而對民國新聞史研究而言，也應

更深入地分析各類襲自西方的專門新聞、寫作、編輯方式在本土的變異。以本研究所處理的運動新聞為例，無疑是仿自西方報紙的成功經驗，而後在各大報紙上繁衍興盛，這些都可以說是重複英美報紙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通俗化潮流。在本文中的確可看到，新聞專業人士追求「現代化」的強烈動機。但在「專業化」、「現代化」的動機外，欲借運動強國的推力，又不時滿溢於紙墨之上。在其他民國時期的新聞場域中，又存在多少這種貌合實異的本土新聞實踐？又如何影響目前的新聞編採工作？這都有待後人持續追溯。

註釋

- [1] 民初運動教育政策的沿革，參考整理自湯志傑（2009）、游鑑明（2009）與楊才林（2011）。
- [2] 三篇社論分別是：〈強國健種繫於體育！〉（世界日報，1933a.10.20）、〈吾人對體育問題之主張〉（世界日報，1934.10.12）、〈全運會閉幕感言〉（世界日報，1935.10.20）。

參考書目

- 弓矢（1934.08.09）。〈由楊秀瓊之被歡迎說到中央游泳池禁止歌女游泳〉，《世界日報》，6版。
- 戈公振（1927／1964）。《中國報學史》。台北市：學生書局。
- 王哲秋（1933.03.02）。〈國難中女子應注意運動〉，《世界日報》，6版。
- 世界日報（1933.04.09）。〈平市府令社會局準備選派全運會選手〉，《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3.04.28）。〈教部通令普遍提倡體育〉，《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3.06.07）。〈發刊旨趣〉，《世界日報》，10版。
- 世界日報（1933.07.12）。〈勗華北健兒〉，《世界日報》，3版。
- 世界日報（1933.09.12）。〈建議以全運會經費建公共體育場〉，《世界日報》，6版。
- 世界日報（1933.10.04）。〈本報特別啟事〉，《世界日報》，3版。
- 世界日報（1933.10.07）。〈王世杰發表對全運會意見〉，《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3.10.11）。〈大會昨日上午十時半開幕林森致詞汪兆銘痛哭失聲〉，《世界日報》，8版。
- 世界日報（1933a.10.20）。〈強國健種繫於體育！〉，《世界日報》，3版。
- 世界日報（1933b.10.20）。〈遼吉黑熱哈選手發表告別書〉，《世界日報》，8版。
- 世界日報（1933.10.22）。〈運動會〉，《世界日報》，9版。
- 世界日報（1933.11.26）。〈本報發起「世界日報杯」足球賽〉，《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3.12.10）。〈體育社會化！運動大眾化！〉，《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4.01.16）。〈最近數年來之蘇聯體育界注重普遍化〉，《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4.01.25）。〈一個溜冰者的談話〉，《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4.10.10）。〈華北運動會開幕〉，《世界日報》，4版。

- 世界日報（1934.10.12）。〈吾人對體育問題之主張〉，《世界日報》，2版。
- 世界日報（1934.12.22）。〈最近十年來我國體育進展情形燕大體育主任黃國安之講演〉，《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5.01.01）。〈我國體育年來有進步〉，《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5.06.29）。〈國民軍教育倡自斯巴達列強皆仿行〉，《世界日報》，9版。
- 世界日報（1935.09.15）。〈平大體委會積極計畫促進全校體育〉，《世界日報》，7版。
- 世界日報（1935a.10.11）。〈現代體育意義端在國防與生產〉，《世界日報》，5版。
- 世界日報（1935b.10.11）。〈應於運動場中建立民族復興基礎〉，《世界日報》，5版。
- 世界日報（1935.10.20）。〈全運會閉幕感言〉，《世界日報》，3版。
- 成舍我（1938／2013）。〈紙彈亦可殲敵〉，舍我紀念館（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頁181-193。台北市：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 成舍我（1943／2013）。〈我們需要平價報〉，舍我紀念館（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頁227-234。台北市：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 吳廷俊、於淵淵（2012）。〈秉持公心、發言論事：「書生辦報」再檢視〉，《新聞學研究》，113：1-38。
- 吳范寰（1982）。〈成舍我與北平世界日報〉，張友鸞（編）《世界日報興衰史》，頁12-39。重慶：重慶出版社。
- 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原書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李金銓（編）（2009）。《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台北市：政大出版社。
- 李金銓（編）（2013）。《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偉（2009）。《報人風骨：徐鑄成傳》。台北市：秀威資訊。
- 汪欣（1935.03.01）。〈想讀書沒地方想運動沒操場〉，《世界日報》，6版。
- 秉英（1933.10.23）。〈關於婦女體育的一個意見〉，《世界日報》，6版。
- 邵飄萍（1923）。《實際應用新聞學》。北京：北京京報館。
- 恬冰（1934.09.02）。〈反對肉慾性的「健美運動」〉，《世界日報》，6版。
- 徐寶璜（2008）。〈新聞學〉，肖東發、鄧紹根（編）《徐寶璜新聞學論集》，頁41-12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徐鑄成（1999）。《徐鑄成回憶錄》。台北市：台灣商務。
- 徐鑄成（2009）。《舊聞雜憶》（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
- 張守約（1933.07.20）。〈華北運動會閉幕後對諸健兒的希望〉，《世界日報》，10版。
- 張詠（2013）。〈以「真相」的名義：留學知識分子對西方報導的批判及對新聞檢查的宣導〉，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285-32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詠、李金銓（2008）。〈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321-350。台北市：政大出版社。
- 許慧琦（2008）。《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台北：學生書局。
- 陳子軒（2010.05.29）。〈台灣報紙運動新聞史概觀〉，「新聞典範的挑戰與另類媒體：紀念成露茜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
- 陳思仁、潘宗億、洪靜宜、蕭道中、徐文路譯（2002）。《被發明的傳統》。台北市：貓頭鷹。（原書 Hobsbawn, E.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游鑑明（2009）。《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育（1895-1937）》。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
- 湯志傑（2009）。〈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台灣的現況〉，《思與言》，47（1）：1-126。

- 紫 (1934.02.08)。〈溜冰的婦女不應豔妝濃抹〉，《世界日報》，6版。
- 黃天鵬 (1952)。〈中國新聞事業大事記：附丁末以來報界繫年錄〉，《報學》，1：132-142。
- 黃金鰲 (1933.10.10)。〈寫在全運會開幕之前〉，《世界日報》，8版。
- 黃金麟 (2001)。《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台北市：聯經。
- 黃順星 (2011)。〈舊聞新史：對台灣新聞史研究的思考〉，《傳播研究與實踐》，1：179-209。
- 楊才林 (2011)。《民國社會教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瑞松 (2010)。《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市：政大出版社。
- 楚人 (1934.10.17)。〈圓滿的閉幕〉，《世界日報》，6版。
- 管翼賢 (1943)。《新聞學集成》(第三輯)。北京：中華新聞學院。
- 際華 (1933.04.04)。〈反對運動選手制〉，《世界日報》，12版。
- 劉昌合 (1935.07.30)。〈我國體育今後應有之改進(一)〉，《世界日報》，7版。
- 樹芳 (1933.12.30)。〈鄉間婦女的體育問題〉，《世界日報》，6版。
- 賴光臨 (1981)。《七十年中國報業史》。台北市：中央日報社。
- 魏均、劉昌德譯 (2001)。《有權無責：英國的報紙與廣電媒體》。台北市：國立編譯館。(原書 Curran, J., & Seaton, J. [1997].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黎青 (1935.01.29)。〈體育與婦女〉，《世界日報》，6版。
- 關容 (1933.10.21)。〈對下屆全運會的期望〉，《世界日報》，8版。
- 蘇碩斌 (2011)。〈活字印刷與台灣意識：日治時期台灣民族主義想像的機制〉，《新聞學研究》，109：1-41。
- Alexander, J., & Jacobs, R. N. (1998). Mass communication, ritual and civil society. In T. Liebes & J. Curran (Eds.),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pp. 23-41).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93). How can one be a sportsman? In P. Bourdieu (Ed.), *Sociology in question* (pp. 117-131). London: Sage.
- Caillouis, R. (1959). *Man and the sacr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Carey, J.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rey, J. (1997). Afterword: the culture in question. In S. Munson & C.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308-33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onboy, M. (2011). *Journalism in Britai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de Burgh, H. (2003). The journalist in China: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inspiration. *Media History*, 9: 195-207.
- Durkheim, E. (196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Eagleton, T. (1981).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Verso.
- Elias, N. (1986a). An essay on sport and violence. In N. Elias & E. Dunning (Eds.). *Quest for excitement* (pp. 150-174). Oxford, UK: Blackwell.
- Elias, N. (1986b). Introduction. In N. Elias & E. Dunning (Eds.), *Quest for excitement* (pp. 19-62). Oxford, UK: Blackwell.
- Foucault, M. (1980). 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 166-182).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ns, H.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uttman, A. (1978).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Polity.
- Høyer, S., & Pöttker, H. (Eds.). (2005). *Diffusion of the news paradigm 1850-2000*. Göteborg, Sweden: Nordicom.
- Huizinga, J. (1955).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Kennedy, E., & Hills, L. (2009). *Sport, Media, Society*. New York: Berg.
- Kitch, C. (2009). Tears and trauma in the News. In B. Zelizer (Ed.),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pp. 29-39). London: Routledge.

- Laker, A. (2002). *The sociolog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MacKinnon, S. R. (1997).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23, 3-32.
- McChesney, R. W. (1989). Media made sport: A history of sports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 Wenner (Ed.), *Media, sports,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McIntire, M. (2009). National status, the 1908 Olympic Games and the English press. *Media History*, 15, 271-286.
- Rowe, D. (1999). *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 The unruly trinity*.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Schirato, T. (2007). *Understanding sports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udson, M. (2002). News, public, n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481-495.
- Trujillo, N., & Ekdom, L. R. (1985). Sportswriting and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The 1984 Chicago cub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261-281.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Williams, R. (1976). *Communications* (3rd ed.). New York: Penguin.
- Xu, X. (2001).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ization of Sports News: A Case Study on Sports News in the *World Daily News*, 1933-1935

Shun-Shin Huang*

Abstrac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after the north-south reunification, the Chinese press briefly thrived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1912-1949). This bloom was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s publications and in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and specialized news reports. By analyzing reports between 1933 and 1935 (a distressing period wherein China was in a state of national calamity) in the sports section of the *World Daily News*, this study illustrates how Chinese sports news was transformed to attain and exud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ocial significance. Whereas sports news signifie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eaning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newspapers, the Chinese counterparts were remolded as a nationalist symbol of glory and vicissitudes.

Keywords: sports news, popular press, *World Daily News*, Cheng She-Wo

*Shun-Shing Huang i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ih-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